

# 第一章 幕末开国前( 17~19 世纪中期) 的日本棉纺织业

## 一、概况分析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衣物就是人类生活不可须臾离缺的日用必需品 衣食住行 以衣为先。衣物以及制衣材料的进步和发展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人类衣物史的发展过程中 制衣材料曾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革。上古洪荒时代 混沌初开,蒙昧未启 人类先民茹毛饮血 以鸟兽皮毛、树叶等蔽体御寒 无织作之工 无衣裳之别 自无可累记。后人类发现了麻纤维 将苕麻浸骨剥皮 染色揉纫 编织成衣 于是才有了织作之工 衣裳之制。继而人类又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绢纱綾罗绸缎,不仅可以遮体御寒 且轻盈华暖 色彩丽艳 又为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增添了诸多华贵之气。但是 丝绸价格昂贵 远非一般士人都可穿用 只有在棉花这种最适合于人类大众穿着需要的纤维植物被发现并被广泛种植之后,人类的衣料来源才真正得到了根本的保证。而近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 也正是从这种与人类生活最贴切 且最适合于近代集团式大机器工业生产 的日用棉纺织业的生产活动中 得以首先发生发展起来的。

棉花为一年生葵科草木植物 有数种。棉花春季下种 夏秋成熟 叶如葵 墨绿 花如槿 色繁 荚如桃 熟裂 絮如丝 精白 籽如豆 椭圆。果实成熟后取之丛生毛状白色纤维 可纺纺织布 印染随



画中所绘‘饿鬼’均裸而无衣可做例证。

然而自棉花种籽再度传入之后，由于棉花易植易种，收益广，获利大，加工便捷，且御寒性能良好，穿着舒适，所以棉花的广泛传播和种植，不仅使日本的一般贫民百姓从此有了便宜易得的御寒之物，而且大多数富贵人家也因喜其舒适保暖、耐穿耐用之故，而多穿用之。故此进入近世之后，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在日本各地便取得了其他农作物所无法比拟的飞速的发展。不过，在 17 世纪之前，棉花种植及棉纺织品生产一直是作为一种农家自然经济的补充而由一家一户的农民小规模地经营着的，其真正作为一种对农家经济发展有利的商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而大规模地发展和发达起来，则已是到了公元 17~18 世纪之交的元禄（公元 1688~1703 年）间的事了。

日本的棉花种植和作为农村工业的棉纺织品生产之所以能在元禄时期迅速繁荣发展起来，主要有下列原因：

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丰沛，且大多数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适合棉花的栽培生长，所以日本棉花种植的单位面积产量颇高，棉花的品质亦较优良。

其次，从社会条件来说，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锁国达二百多年之久，这种锁国措施虽然不利于对外交流的一面，但亦因得以少受外部世界动荡的影响，国内基本无战事，亦无外来侵扰。长期的社会稳定保证了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的日趋繁荣，民众对棉花布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也就因之不断扩大，这使得日本国内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有了越来越广大的需求市场。

第三，自 17 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国内农业生产中的商品性农业及相关农副业经营逐渐发展起来。如著名的“四木三草”——即茶、漆、桑、楮和麻、蓝、红花等经济性农作物的生产和加工业，在当时农业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农民通过对这些经济性农作

物的经营和贩卖，便在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渐渐产生出了一定的生产剩余。这种生产剩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愿意将更多的剩余资金投入用于改进和扩大商品性农业及农副业的再生产。而植棉地区的农民则由于植棉生产和棉纺织品加工的获利性大等原因而将棉花的种植和棉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可以使自己发家致富的有利的商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大力发展。同时棉区农民通过对棉花品种的改良和对棉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提高了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经营的生产力，使得棉业经营在当时蓬勃发展起来的诸多商品性农副业生产经营中愈来愈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第四，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军以及各地封建领主为了巩固自身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日本全国的道路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备建设，这在客观上为日本国内的商品经济流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作为一种商品经济，流通和贩卖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道路交通的整备为棉花和棉纺织品在各地区间及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销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除此而外，江户德川幕府和各地区的封建领主为了加强自身统治的经济基础，对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实行了许多特殊的保护和奖利政策，这些保护和奖励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

下面我们就来稍微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品加工业发展的大致概况。

从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以德川家族统治为核心的江户时代（公元 1600~1867 年）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德川家族自公元 17 世纪初取得对日本全国的统治权力以来，所实行的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封建领主制式的“大封建”统治，即所谓的“幕藩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德川将军名义上接受皇室（天皇）的授封，居江

穴(今东京)开设幕府,总领全国统治权。而作为将军的佐翼,则将全国各地的土地和臣民分封给曾跟随德川家打天下以及在全国统一过程中先后归顺德川家的大封建领主武士(大名)封藩立国,屏障公庭。被分封在各诸侯领地(藩)的大名领主则又根据主从身份将本藩土地臣民以俸禄的形式赐封给自己手下武士团的武士,以取得武士阶层对自己的效忠。当时有土地的农民被称为“本百姓”,他们不许离开自己的土地,不许转营其他职业(即身份制),每年必须将自己收获物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以上的部分,以封建贡租(本年贡)的形式缴纳给封建领主,以取得对土地的继续耕作权。同时还必须负担各种沉重的杂税,当时称为小物成,和封建徭役(如各种“助乡役”等)。从经济体制上来说,这是一种以“本百姓”(即有土地的农民)经营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年贡剥削(即石高制)为核心的“独特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在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权力,日本全国的山川土地名义上(即公仪)都属于德川将军所有,各种自然资源(如森林、矿山、港湾等)也几乎全部掌握在幕府和各个大封建领主(诸藩大名)手里,而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则以封建隶农的身份紧紧地被束缚在世代相袭的土地上,成为封建领主阶级的主要剥削来源。从人类社会史的角度来说,日本的这种封建经济统治形态尚留有一定成分的奴隶制倾向。对于土地和封建领主来说,农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只能算是一种“隶农”,因此有时日本的这种封建剥削体制又被称作“封建贡纳制”。日本的这种封建贡纳体制虽然与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封建领主经济体制颇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其中却更多东方专制主义的成分和色彩,笔者以为可以将其称为一种比较独特的、东方式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体制。这种独特的、东方专制式的领主制封建经济体制正是德川幕府维持其封建统治存在的最根本的经济基础之所在。

为了维护这种以“封建贡纳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体制 使之得以长治久安，以德川幕府将军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建立了以封建武士为主体的庞大的军队—武士团，同时还建立了强大的中央和地方财政。除此而外，为了维持封建小土地经营和封建年贡的收入，将农民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永远作为他们剥削压榨的工具，幕府将军和各地方大名领主还不断通过各种“禁令”以对农民的生产活动乃至生活细节进行无所不至的超经济强制性统制。如在封建身份制的严格限制下，农民必须一心耕作，不得随意转营他业，不得自由离村出外做工，登记在册的土地称为“本田”<sup>③</sup>，本田“只能按规定种植稻米、小麦等一般农作物，不许自由耕种其他作物。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许永久性买卖。为了维护“本百姓”的户数，防止土地过分分散，严格实行家族长子继承制，规定农家次子以下子女不得继承家业。普通农家百姓只许一日两餐，不许三餐，只许吃粗茶淡饭，不许精食糜费，只许穿粗衣布裤，不许华衣丽裳，等等，不一而足。在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农民的妻女不许随便串门聊天，否则就要被休弃<sup>④</sup>。在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尚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农民在上述沉重的封建贡租剥削和各种超经济强制的重压之下，生活自然苦不堪言，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家庭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无法维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自然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而封建统治阶级正是欲通过这种将农民压榨得“不死不活”（本多利明语）<sup>④</sup>的办法来维持其封建秩序的稳定和自身统治的延续。

但是，在江户时期，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性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业还是相当发达的。众所周知，在 16 世纪中后期的“织丰时代”，日本城镇经济既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又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政策，令封建武士离乡城居，同时为了防止各地封建领主大名背叛谋反，德川将军命各地大名将妻子送到江

户居住 以为人质 无特许不可离京 封建领主则须每隔一年到江户居住一定时期 向将军述职参觐 参觐交代制 )这种体制虽使各地封建领主疲于奔命,削弱了地方领主的财力,但却促进了江户、大阪等都市商品经济的发达。江户时代 京都、大阪、江户三座城市号称“三都”京都乃日本原来的首都所在地 天皇所居 贵族丛集。至江户时代虽已淡薄了昔日的繁华 然民风所化 世情依然 烂熟之地 奢靡如旧。京都所产绢丝织品 如有名的西阵织 质地华美 作工独特 各种手工艺品亦名逾遐迩 为远近所求 大阪地处日本东西交通要衢 依水陆码头之势 聚商贾云集 携百货辐凑 有“天下厨仓”之称 日本全国各地所产商品货物,一般多先集中到大阪市场 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销售。各地大名领主所收取的“年贡米”也多先在大阪市场贩卖 换取货币 再购置各种生活必需品 送往江户等地 以供封建领主、武士及其家庭子女都市居住生活的需要。因此大阪地区商人资本势力历来强大 德川幕府及当地领主势力亦惧其三分 江户 今东京 乃德川将军幕府驻跸之地 是一座新兴的大消费都市。江户城下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诸侯大名和公卿武士们的豪华府第。为了维持这些大名、公卿们奢侈生活的需要,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抵江户城下,使得江户城中货栈林立 店铺喧嚣 浮世奢华 糜风日盛。

除此而外,各地方封藩大名为了维持本藩财政及因“兵农分离”而造成的封建武士城居生活的需要,也积极发展本藩的所谓“城下町”经济。“城下町”即以封建领主居城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商业性城市,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以供给封建武士生活所需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都市商人和手工制造业者,可以说是诞生日本近代市民阶级的发祥地。这些“城下町”商人和手工业制造者的生产活动,同时又与以大阪为中心的封建领主中央流通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以封建领主经济为核心的全国性消费市场。不过,

当时这种以封建都市繁荣为中心的商业和手工制造业活动，基本上还是作为封建领主经济的一种补充成分，并且是为了适应封建领主的政治统治以及武士阶级城居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存在的。这些都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和限制（如强制征收的各种御用金、冥加金和等级身份制等）但是同时他们又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御用在株权，即行会权等）与封建领主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以都市商人和都市手工业者为主体的都市商业活动以及手工制造业活动，与当时日本经济的主体——农业和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相互隔绝的，即便有一些业务上的关系，也只是某种间接的联系。

以大阪地区市场为例，在江户时代前期，大阪市场每年上市的大量交易品中，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上是以各藩封建领主的“藏米”（即封建年贡，亦称为“领主米”）和各藩的专卖品为主，而真正属于农民直接产品的商品则少得可怜。在这种都市性商业活动中，一部分大商人虽然也能通过封建领主所赐与的各种特权积攒起一定数量的货币乃至成为巨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的积累），但因为这种商业资本（亦或高利贷资本）的营利所得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对农民剥削所得的部分转让（亦即所谓让渡利润），其本身并不构成某种单独的生产方式，所以这种商业或高利贷资本从本质上来说乃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前期性资本”<sup>⑤</sup>。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前期性资本”的活动虽然有时也会超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对封建统治的社会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各国的历史中几乎都曾出现过“抑商”的现象或历史阶段，江户时代的日本也曾多次发生过抄没商人家财或强迫商人放弃对领主的债权（弃捐令）的事件，但这种“前期性资本”却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对封建统治的附属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这种“前期

性资本 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也永远不会“自觉地”起来否定它所依附的封建经济体制，至多只是对其施以一定程度的改革和改造，使其继续存在 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一损俱损，一亡俱亡。

但是 进入 17 世纪后期之后，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即以农民的商品生产（为了出卖而从事的商业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经营）和商品流通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活动逐渐冲破封建经济的藩篱而活跃起来，并已开始威胁到了封建统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封建小农经济和年贡剥削体制的稳定。为了挽救封建体制的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三令五申，抑商抑奢，极力提倡农本主义，以阻止商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渗透。在当时日本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商品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经营中 以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生产为其大宗。棉布是平民乃至大部分武士阶层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棉花生产“不劣稻作 而所务弥多”且棉作“勘可直完贡纳”（《地方落穗集》）所以德川幕府及各藩领主在各种禁令中虽然禁烟、禁蓝（蓝草，一种染料）禁甘蔗 惟独不禁棉花和油菜籽的种植加工 而一般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得穿绢穿綾穿绸缎 但却被允许可以穿棉布制品。于是，随着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普遍繁荣以及幕藩领主对棉花种植和棉纺织生产的奖掖提携，棉花及棉纺织品生产便逐渐超越其他商品性农业生产而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至公元 17 世纪～18 世纪的元禄（公元 1688～1703 年）年间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手工业生产已经发展成为日本国内商品生产的主要产业之一了。江户前期的农政学家宫崎安贞<sup>⑥</sup>在其所撰《农业全书》中曾生动地描述了棉花种植在日本全国各地普及的情况。他写道：

“本朝自百年前棉种传来 及今普及。南北东西 无地不

宜。而尤以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备后之土地肥饶之所植之甚得润利。故（农民）宁止五谷而多作如是也。

（注 河内——今大阪府北、中、南河内三郡地区。和泉——今大阪南部地区。摄津——今兵库县南部地区。播磨——今兵库县西南部地区。备后——今广岛县东部地区。下同）

又文政十年（1827年）当时的经济学家佐藤信渊<sup>⑦</sup>也在其所撰《经济要录》一书中对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何以能在江户时代中后期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作了如下精彩的描述：

“迄天正、文禄之顷，富贵之家虽得穿著绢纱而故轻暖，然贫贱人等只可凭借麻布所制刺儿以凌严寒，是颇艰涩。……及草棉种子出世，至卑贱下民亦得穿著棉布暖袍，虽寒气凛烈亦无患，此伤失。由是观之，草棉实下民辈等护体之至宝，欣戴无上’，

总之，由于棉花种植无地不宜，棉纺织品无所不用，且贫贱下民亦得穿用，不在幕府诸禁之内，所以许多农家为植棉生产的有利性所吸引，“宁止五谷而多作如是”竞相发展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因此到了江户中后期，日本各地就已经形成了许多以种植棉花著称的专业区域，并培植出了许多适于在本地生长的优质品种棉，如摄津国川边郡·武库郡——阪上棉，山城国缀喜郡——山城棉，河内国诸郡——河内棉，大和国诸郡——大和棉，和泉国堺市——河内棉，播磨国诸郡——播磨棉；安艺国广岛郡——广岛棉，备前国中岛郡——中岛棉，备中国诸郡——备中棉，备后国诸郡——备后棉，周防国诸郡——周防棉；常陆国真壁郡——真壁棉，下总国上总郡——上总棉，淡路国诸郡——淡路棉，纪伊国诸

郡——纪伊棉 赞歧国诸郡——赞歧棉 伊予国诸郡——伊予棉；  
伯耆·出云国诸郡——出云棉 丹波国诸郡——丹波棉 三河国·  
远江国诸郡——三州木棉；尾张国诸郡——尾张棉 美浓国诸郡  
——美浓棉。另外还有近江棉、信浓棉、武藏棉、上野棉等等。在这些  
优质棉花品种中，尤其以摄津国川边·武库二郡所产的“阪上  
棉”最为著名，有“诸国品位第一”的美称，同时也是当时用以衡量  
诸国棉花品种质量高低好坏的“标准棉”<sup>③</sup>。

棉花种植的普及带来了棉纺织业的兴隆和发展。初始时期的  
棉纺织业生产活动主要是以农家副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棉花收  
获之后，棉区农民利用农闲之暇，动员妻子儿女纺纱织布。所成布  
疋，除留一部分自用之外，剩余者则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出售，所得  
钱财用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以及日  
本国内棉纺织品需求市场的扩大，到了 18 世纪后期，在部分棉业  
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以生产各种棉纺织品为中心的  
棉纺织机业地。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目前对当时日本全国的棉  
纺织品（包括棉纱和棉布）的总产量尚无比较精确的数字统计，因  
此只能根据遗留史料中的有关记载，作推量性的大致估计。

当时日本各地所产棉花和棉纺织品，除农家自用和在本地销  
售者外，凡出滨（即运出本地区）贩卖者，一般多首先集中于大阪市  
场，经大阪地区商人的批发，再运往各地售卖。在各地运至大阪市  
场的棉花和棉纺织品中，棉花产品多销往江户、越中、加贺、越后、  
萨摩、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羽前、羽后、安艺、播磨、和泉、  
纪伊、周防等产棉较少或棉纺织业较发达和集中的地区，一部分作  
为当地城乡的生活用棉，一部分则由当地农家纺成纱线，织成布  
疋，再回销至大阪市场。而集中到大阪市场的棉纱产品则主要销往  
京都、大和、美浓、和泉、纪伊、越中和琉球等地，这些地区是当时日  
本织布业的集中地。大阪市场上棉布的销路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和

北阪等高寒地区。

根据《大阪市史》所收有关资料统计 江户后期元文年间(公元 1736~1740 年)大阪市场上棉类产品的年平均上市量中计有 籽棉——1603878 日本斤(以下略称斤)<sup>⑩</sup>;皮棉——354392 斤(约 48586400 匁);棉纱——390725 斤(52096700 匁);白棉布——1178391 反<sup>⑪</sup> 条纹棉布——32763 反,总价值白银约 12161975 匁(按时价 折合黄金约 202700 两)<sup>⑫</sup>。

享保年间,仅由大阪市场运往江户地区的棉布和皮棉产品即达下表各年度统计之数(图表 1)。

图表 1 享保年间由大阪运往江户棉制品量表

年 代	棉 布	燥 棉	备 考
	反	贯	
享保 9 (1724)年	1,047,100	1,242,360	
享保 10(1725)年	818,000	828,144	
享保 11(1726)年	1,217,100	1,177,428	
享保 12(1727)年	2,017,900	1,612,572	
享保 13(1728)年	1,392,600	944,352	
享保 14(1729)年	1,289,300	1,228,576	
享保 15(1730)年	1,394,700	1,008,300	

备考 本表根据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三瓶孝子:《日本绵业发达史》中有关数字作成。

以上数字到了 18 世纪末的天明五年(1785 年)仅棉布类计有 白棉布——255 万反 条纹棉布——8 万反。而到了 19 世纪初的文化·文政年间(公元 1804~1829 年)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平均数字增长了近 5 倍之多<sup>⑬</sup>。

又据明治十三年《日本绵糸纺织会月报》第 14 号所载 维新前日本全国棉花产量约为 3,700 万斤左右 其中畿内 1,300 万斤 东

海道 700 万斤, 东山道 200 万斤, 北陆道 30 万斤 山阴道 300 万斤 山阳道 1,000 万斤 南海道 200 万斤 西海道 50 万斤。而按照中村哲最近的估计推算 则开港后不久的 1858 年日本国内的棉花生产量已达 3,780 万斤 棉纱 2,835 万斤 棉布 1,575 万反<sup>15</sup>。由以上数字亦可推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来棉业的发展速度和各时期所达到的大致规模状况。

在当时日本各地所产各类棉布产品中, 以白棉布和条纹棉布( 编木绵 为其大宗。下面是高村直助氏就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 分别就当时日本国内所产主要白棉布和条纹棉布按其产品、产地以及兴盛期的年产量( 估计产量) 顺序整理成的一个统计表( 稍有节略) 根据这张统计表格中的统计 读者可对 18~19 世纪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概况有一个形象直观的认识。其中图表 2 为白棉布的品名、产地、兴盛期、年产量统计表 图表 3 为条纹棉布的品名、产地兴盛期统计表。

图表 2 18~19 世纪日本产白棉布品名、产地、兴盛期、年产量统计表

产品名	产地名	兴盛期	估计年产量	备考
真冈木绵	群馬县芳贺郡	文化·天保期	38 万反以上(105 万反)	享保期已知名
新川木绵	富山县中·下新川郡	文久期	150~200 万反	
三河(三州)木绵	三河国冈崎·碧海·幡豆	天保期	(90 万反)	明和元年自平坂运江户量
知多晒	尾张国知多郡	弘化·嘉永期	55~61 万反(44~49 万反)	贩卖量为“江户积高”
河内木绵	河内国中河内	天保中	200 万反	
和泉木绵	和泉国泉南郡	文久期	240 万反	河泉木绵·天下第一
姫路晒	姫路国	天保期	200 万反	领内 151 万反、领外 49 万反

青谷木绵	因幡国	安政・文久期	(20 万反)	仅限于京坂移出量
浜目木绵	伯耆国	文化期	15 万反	仅限于米子以北产量
仓吉木绵	伯耆国	天保期	(30 万余反)	京坂移出量
出云木绵	出云国	天保期	(50 万反)	他国贩卖量
今治木绵	伊予国越智郡	文久期	35 万反	

备考：(1) 本表根据高村直助：《维新前后の“外压”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社会科学研究》第 39 卷第 4 号 1987 年 12 月）一文中有关数字统计作成。

(2) “估计年产量”一栏中 ( ) 内为年贩卖量。

图表 3 18~19 世纪日本所产条纹棉布品名、产地、发展期统计表

产品名	产地名	发展期	估计年产量	备考
龟田縹木绵	(新潟)龟田	宽政期	—	
见付縹木绵	(新潟)见付	天保・弘化期	—	
邑乐饼	(群马)邑乐	享和期	—	
佐野縹・缩	(栃木)佐野	文化期	—	
埼玉青縹	(埼玉)北埼玉	文化・文政期	—	
足立縹木绵	(埼玉)北足立	文久期	—	
所泽饼	(埼玉)所泽	安政期	—	
尾北縹木绵	(爱知)尾北	文化・文政期	—	
尾西縹木绵	(爱知)尾西	文化・文政期	—	
大和縹饼	(奈良)大和	17 世纪后半期	—	
樽井纹羽	(大阪)樽井	天保期	—	
播州縹木绵	(兵庫)播州	宽政・享和期	—	
姫路晒	(兵庫)姫路	文政期	—	
儿岛小仓	(冈山)儿岛	安永・文政期	—	
芦品饼	(广岛)芦品	弘化・文久期	—	

沼隈縹緋	(广岛)沼隈	文化・文政期	—	
岩国缩	(山口)岩国	元禄	—	
松山缩	(爱媛)松山	文化・文政期	—	
久留米緋	(福冈)久留米	万延期	—	

备考：(1) 本表根据阿部武司：《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在来产业——绵织物业の場合》(梅村又次。中村隆英编：《松方财政と殖产兴业政策》国际连合大学发行，东京大学出版社会发卖，1983年所收)一文所载统计表格作成，有删减。(2) 产地名一栏中( )内为现在所属县名。

通过以上两表统计，我们可以对日本江户时期白棉布产地的地理分布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时日本国内白棉布的主要产地除群马、富山两县外，绝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和关西地区。其中产量最多的为河内、和泉(今属大阪地区)两国，余下依次为姬路、三河、尾张、新川等地。如果将上述统计表中各地区的外运(出津)贩卖量作为生产量的50~80%进行粗略估算的话，则仅上述地区的白棉布生产量即已高达1200万反~1300万反以上。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时日本全国白棉布的总生产量应比这一数字高得多。

在日本的近世时期，条纹(縹、木绵)属于一种较高级的棉纺织品，有多类品种。从“缩”、“緬”、“緋”、“晒”、“纹羽”这些品名上可看出，显然是吸收和利用了传统的丝织工艺和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并多少带有“地方特产”的色彩。由于条纹棉布的纺织工艺要求高，工序复杂，所以条纹棉布的产量较白棉布为少。条纹棉布的织造程序一般是先染色，后上机，所以其最后一道工序多不经染房，下机后由农家直接运送到市场出售，因此史料中也就更难找到比较确切的产量数字记载。故图表3中的产量一栏也就只好暂时缺而不记了。通过图表3的统计可知，江户时代条纹棉布的产地主要集中在现在属于关西地区的大阪、兵库、奈良以及爱知、冈山、广岛、福冈一带和关东地区的埼玉、栃木、群马等地区，而北陆地区仅只新潟县一处有少量生产。

另外从上述图表 2 图表 3 的统计中还可以看出 不论是产量较大的白棉布还是工艺复杂的条纹棉布 虽然其生产集中地 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棉纺织机业地 绝大多数都是在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这一时期内逐步发展起来的, 但其繁荣兴盛期却几乎都是到了属于江户时代后期的‘化政天保时期’(公元 1804~1843 年) 才开始形成的。这种情况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大阪地区棉布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时日本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吻合的。据日本学者中村哲氏在其所著《明治维新的基础构造》一书中的推算估计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被迫开港通商后不久的 1858 年 日本全国棉布的年总生产量大约为 1575 万反<sup>④</sup>。考虑到当时因西方各国的棉纺织品已大量涌入日本, 日本国内的棉布生产实际上正处于衰落时期 以及当时统计上的疏漏 估计 19 世纪上半期 即棉纺织品的鼎盛时期 日本国内棉纺织品的总生产量肯定要比这一数字更高一些 亦或起码不会低于这一数字 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从这一组数字中的日本全国棉布总产量 1575 万反) 中减去我们在前文中推算估计出的开国前日本棉纺织业发展鼎盛时期全国白棉布的产量, 就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幕末开国前这一段时期里日本全国条纹棉布的年产量, 即大约在 270~370 万反左右。当然 这只是一个建立在推算了又推算的基础之上的非常不精确的数字。不过在目前尚未发现更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尚无法推算出更准确的统计数字的情况下, 这个数字或可作为一个权宜上的估算数字, 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繁荣发达程度的理解和想定。

即如前述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是一种易普及、获利较大的新型商品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经营, 而且由于幕府和各藩领主出于为确保中央和本藩财政的考虑, 不仅不禁止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的加工生产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奖利保护<sup>⑤</sup>, 上田亦

可植作棉花作物，于是许多有条件的农户便开始不断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有时甚至不惜减少向来受到重视和保护的稻作生产，而纷纷竞相发展棉花种植和开展更大规模的棉纺织业加工经营。在日本现存的一些史料中，对当时日本棉区农村中棉花种植情况曾做过非常生动精彩的描写。每当棉花收获季节，棉区所至，田里是“一片雪花白，农女采棉嬉”。村中是“户户纺车声，家家闻机杼”。农家妻女无分老幼，几乎全部投入了繁忙的纺纱织布劳动。《和歌山县志》所收当时人所写的一篇调查和描述当时棉纺织业繁荣发达的状况时认为，棉花和棉纺织业生产当时实际上已成为棉区普通农家发财致富的“民间之第一副业也”<sup>⑤</sup>。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棉花种植、棉纺织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日本国内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生产力比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畿内——今大阪、京都一带；濑户内——今冈山县一带；尾西——今名古屋西部一带；足立——今栃木县一带等地区），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宽政年间（公元1789～1800年），已出现了一些比较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作坊，而农民阶层中也出现了以新兴地主、富农和农村工场手工业经营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并由此而从这些商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中产生出了日本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萌芽（详后叙）。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发达，激发了日本国内各类专以经营“农民的商品”为主的商业活动的活跃。在这些活跃起来的商人中，既有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以“三都”为中心的各种“前期性”大垄断商人集团，也有从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农民阶层的阶级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乡商人”。尤其是后一类“在乡商人”的活动，因其原本就是从农民的商品生产和农村商品流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农村商品经济活动环节